

四、習近平治下的宗教政策和實施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梁潔芬主稿

- 中共管理宗教事務，以毛澤東時代的「宗教自由政策」為基礎，依循馬列思想管理與操控宗教，最終目的是使宗教滅亡。至宗教政策落實情形，視不同政治環境而異。
- 習近平主政時期，發佈國家安全藍皮書、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及宗教白皮書等三項重要宗教文件，將宗教事務提升至國安層次，依法嚴管宗教，並以國家安全與維穩為由，美化各種管控措施，企圖將宗教嚴控拉回毛澤東時期。

（一）中共宗教事務的基本依據：「宗教自由政策」

毛澤東時代，採行統戰部長李維漢推薦的「宗教自由政策」，管理宗教事務，其最終目的是使宗教消亡（毛澤東時代要宗教馬上滅亡，後毛時代是要削弱宗教在社會主義國度的影響力，使它逐漸衰亡）¹，時至今日，這項政策仍是中共處理宗教事務的基礎，為國家控制宗教的主要依據²。換句話說，黨國巧妙的運用「宗教自由政策」的解讀，依無神論辯證法下的馬列毛思想去管理和操控宗教，依當時的統一戰線的路向，使宗教為黨服務³。此與國際社會所稱宗教自由，兩者在實施上可謂是背道而馳。

至於如何在運用在管理宗教事務上，視當時政治環境而定。如 1982 年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推出之初，中共中央發出「中發（1982）十九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印發「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包括如何管理宗教場所（含宗教活動類型）、宗教團體（含與黨/國關係）、宗教人員（含培訓、管理），及宗教團體對外關係等。以當時的國家開放程度與毛時代相比，十九號文件使宗教生活枯木逢生，春芽待發，但政府的操控仍在。至江澤民時期以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政策，當時經濟開放帶來宗教生活的蓬勃，並依據黨的需要，1994 年制訂兩個全國性宗教行政法規，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及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⁴胡錦濤時

¹ Beatrice Leung,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An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4 (Dec.2005):894-913.

² 劉澎著『宗教問題文集』（內部資料僅供參考）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103-116.

³ Beatrice Leung,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An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⁴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1999『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代，經濟起飛，社會問題複雜，政府需要比十九號文件更詳盡、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宗教政策，管理宗教事務，於是 2004 年 11 月 30 日中共國務院令第 426 號公佈實施「宗教事務條例」。

（二）習近平治下三份宗教文件

習近平時期，2014 年 5 月 6 日推出「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⁵（簡稱國安藍皮書），談及近期國家的安全面臨重大的挑戰，其中安全包括意識型態的安全，將意識型態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層面，國安藍皮書提倡收緊對宗教的規管，對宗教的加強操控多了堂皇的理據。第二份為 2017 年 6 月 14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修訂通過新「宗教事務條例」，依黨的需要管理宗教院校、活動場所、教職人員、宗教活動、宗教財產，以及要求宗教承擔某種法律責任等。該條例涵蓋的內容相當詳盡，能細緻的處理涉及宗教界內細微的問題，為習近平治下管理宗教的一項嚴謹措施。

第三份是 2018 年 4 月 3 日國新辦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以國家安全為由，以維穩為定調，對包括宗教在內意識型態加強控制，習近平任內，對維權律師陳光誠的逼害，對諾貝爾得獎者劉曉波在大牢內不人道的待遇，以及折磨至死，儘管國際社會指責其非，但北京政府充耳不聞，這初步表示國家的意識型態安全，高於國際社會上的國家形象。

當意識型態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國家對宗教操控不會放鬆，但對外又要將它美化。宗教白皮書的推出，目的是向世界宣示中國大陸在習近平新政下所謂的「宗教自由」。文中對宗教自由的解釋，沿自毛澤東時代的解釋，香港的政治評論與國際輿論對白皮書多為負評，中共在嚴厲打壓宗教自由時，以國家安全和維穩凌駕宗教自由，以歪理美化對宗教的控制，將不自由說成自由，將監控宗教說成管理宗教，以「中國化」為口號，美化由無神主義者去控制有神論的宗教措施（桑海神州，2018.4.4）。

（三）習近平時代宗教管制作為

2013 年起浙江省千餘間教堂的十字架遭拆卸，2018 年開展至江西、山東、廈門等地。2014 年開始強拆教堂，2015 年在浙江省對基督徒的逼害

⁵ 劉慧主編 2014 『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超出想像，移除教徒家中的聖像，改掛習近平照片（天亞社，2015.4.22）。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習近平藉意識型態的操控，以求社會和政治上的安全。

2016年1月，中共將7名曾在敏感的宗教問題和政治事件上辯護的維權律師拘禁後判以重刑（天亞社，2016.1.13）。運作20年的北京中國婦女法律輔助服務中心，亦於同年1月關門停辦，傳為受高層組織領導人所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 January 2016）。

2016年4月22至23日習近平在全國宗教會議指出，宗教問題、國家團結和國家安全有極大關係。在宗教領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堵截外國勢力的滲透，並提醒宗教必須支持共產黨領導，必須服屬於國家的法律和利益之下，遵守國法、接受國家的管制、參與社會主義式的現代化，貢獻自己完成復興中華的「中國夢」。翌日人民日報社論，明認國家管控宗教的必要，以達中國特色的宗教管理的效果，切實地將宗教生活適應國家的政策。2016年7月中國主教團會議和全國愛國會會議召開，將全國修院的課程和教材重新評量，以配合國家的政策和要求。

此外，針對基層基督徒控制，不准家長帶小孩進教堂參與宗教崇拜，美其名是維護孩子的信仰自由，18歲後才自由選擇信教與否，惟與傳統自幼從父母手中傳信仰有異。神父和牧師們需政府特別身份證才可行聖事，這對拘捕地下教會的神父和家庭教會的牧師始有法律依據。近日中共更以聖經無國際書號 ISBN 為藉口，全國禁售（聖經自1980年起不能在國營書店出售，但民營的如淘寶、京東和亞馬遜等網站，及教堂均能販售）⁶。

至於拘禁地下主教則時有所聞。如溫州的邵祝敏在過去3年4次被帶走，政府要求梵蒂岡協助請汕頭建堅主教和閩東的郭希錦主教，讓位於非法及祝聖無效的黃炳章和詹思祿主教。

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任內雷厲風行拆十字架拆教堂，2017年升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轄下的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這是強力施行中央的「宗教自由政策」而獲嘉獎升官的例子（自由日報，2018.3.15）。

（四）總結

⁶ Christina Zhou, Vicky Xiuzhong Xu and Bang Xiao "Bibles pulled from China's online bookstores as Beijing releases white paper on religious policy". <http://www.abc.net.au/news/2018-04-04/bibles-allegedly-pulled-from-chinas-online-book-stores/9616560> (於2018年4月6日摘錄)

以「宗教自由政策」為基礎的中共治理宗教政策，至習近平一言堂的時代，對宗教的操控亦跟著加強，要求宗教為黨服務、依黨的指導而行事。習近平的三份文件表現出其政權在宗教事務上的三個面向，首先將宗教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層次，要求宗教適應國家的需要。其次修訂宗教條例，以嚴峻的法律規管宗教，將教會人士像飛鳥般趕入管制宗教的鳥籠。最後，白皮書美化中共對操控宗教生活的種種措施，顯示中共對宗教的嚴控回復至毛澤東時代的水平。